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Negaraku：旅台、馬共與盆栽境遇

Negaraku: Sojourning in Taiwan, Malaysian Communist and Bonsai Situation

doi:10.6752/JCS.200809_(7).0003

文化研究, (7), 2008

Router: A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7), 2008

作者/Author：黃錦樹(Kim-Chew Ng)

頁數/Page：75-104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08/09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6752/JCS.200809_\(7\).0003](http://dx.doi.org/10.6752/JCS.200809_(7).0003)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 (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 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Negaraku:
Sojourning in Taiwan, Malaysian Communist and
Bonsai Situation

—Kim-Chew Ng

***Negaraku* :**
旅台、馬共與盆栽境遇

黃錦樹

特別感謝莊華興、高嘉謙及吳子文諸位先生協助收集資料。也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後文簡稱審甲、審乙）的費心審查（尤其是審乙），提供了不少批評的意見，頗有助於我澄清某些論點、反省自己的偏見。但部分意見我不見得贊同，將在爭論現場的腳註裡回應。Keng We Koh的論文為審乙所提供，謹此致謝。

送審時之原題為〈盆栽境遇：*Negaraku*與馬共〉，2008年5月24日宣讀於淡江大學第12屆社會與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淡江大學中文系主辦。現調動*Negaraku*的位置，乃以「*Negaraku*」（大馬國歌，喻祖國之愛）為主題，借三個個案（馬華文學、文化與及兩個影片）與殊異的地理場域以論之。三者間既是平行的（三個「平面」），也互喻。關於馬華文學、文化因我過去已有若干論文討論，這裡就不再多費篇幅。這樣的調整意味著重點的移置，也可以避免掉部分內在於「盆栽境遇」本身的論題限制（它也有它的「盆栽境遇」）；相較之下，*Negaraku*是個更大也更有意思的論題。論文在修改過程中，漸漸意識到後者的可能性，而這篇小文章也還只是個初步嘗試而已。

兩位審查人都提到文學和影像是不同的，有各自的技藝、歷史、閱聽人、官方壓制，甚至認為我把這些不同的個案擺在一起是不對稱的。我想調動主副標題的順序應該可以部分解決這樣的疑問。我強調的是，一、相較於華文文學，媒體是更好的跨語個案，但一旦觸及政治禁忌，遭受的政治暴力更直接也更尖銳；而因為其閱聽人可以跨族裔，產生的效應也非文學所可比擬。二、*Negaraku*和《最後的馬共》恰好給我提供一個切入點，去反省旅台和馬共這彷彿是不可比較的歷史分枝，他們的祖國之愛。

黃錦樹，暨南大學中文系教授

電子信箱：Kcng@ncnu.edu.tw

摘要

作為非中華文化區較具規模的華文文學，馬來西亞的華文文學一直持續地生存著，甚至略有「發展」。但其生存境遇其實沒有多大改善。這不僅是文學社會學的議題，也可說是文學政治學的議題。

本文擬延續本人過往的討論——關於語言上的種族與政治隔離，媒體的正反面作用等等——從馬華文化的盆栽境遇進而討論兩個晚近的跨語媒體個案（黃明志事件、《最後的馬共》事件）。這兩個個案都涉及馬來亞建國以來歷史的某個獨特面向，前者是旅台（50年代以來華裔學生大規模地留學台灣）及關連的政治文化背景，後者則是馬來亞共產黨的革命被邊緣化，終至被逐出檯面的歷史。本文著力提出，就時間而言，二者同時，恰為互換。而這互換也是冷戰政治的產物，既捲入中國國共之爭的海外延長賽，也捲入韓戰後美國的東亞布局，對紅潮的防堵。馬共的和平村，緊急狀態下的新村，旅台（小）知識社群，於焉互為隱喻。在這不同的脈絡下，大馬國歌 *Negaraku* 都成了反諷的哀歌。

關鍵詞：*Negaraku*、馬共、在台、新村、盆栽境遇、跨語

Abstract

Mahua Literature is the biggest literary field outside mainstream Chinese Literature. As a minor literature in Malaysia, it continues to survive, though with limited development. But its difficult circumstances remain due to the politics of literature in the country.

Extending from my previous studies on racial and political discrimination on language in Malaysia,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xamine the bonsai situation of the cultural production of Chinese Malaysian and focuses on two recent translinguistic media cases--Huang Mingzhi incidence, and the event of *The Last Communist of Malaysia*. Both cases concern the unique sides of Malaysian history after its independence. The former is the case of Chinese Malaysian students in Taiwan (since 1950 a large number of Malaysian Chinese students study abroad in Taiwan) and its relevant cultural-political background. The latter is the marginalization of the Communist in Malaysia and their expel from the history of Malaysia. This paper tries to point out that the retreat of the Communist in Malaysia and the study abroad of a large number of Chinese Malaysian students in Taiwan happened to take place in the same historical moment. Both were the consequence of the Cold War. Chinese Malaysians were forced to involve in the extended struggle of Kuomintang and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overseas and the East-Asian policy of America after the Korea War. The Peace Village of Malaysian Communist after 1989, the Chinese New Village formed under the emergency, and the small intellectual community of Chinese Malaysian in Taiwan each becomes a metaphor of the other. Under these different contexts, the national anthem of Malaysia, the *Negaraku*, thus becomes an elegy.

Keywords: *Negaraku*, Malaysian Communist, in Taiwan, New Village, bonsai situation, translinguistic media

是一個不平的世界
造成這一株株被壓縮的美麗
你把千古直道的寂寞
塑一個無語的控訴

—— 田思，節錄自〈盆栽〉（1994: 86）

一、馬華文學與文化的盆栽境遇

田思這首寫於1985年，篇幅不大但略嫌鬆散的詩，以直白的明喻寫出中華文化在大馬被轉換成盆栽的狀態。但他把這種狀況看成是一種文化抵抗，把問題設置在傳統與現代的對立上：

當歌聲被噪音淹沒
箏也蒙塵啞啞
你把被壓抑的熱情
澆入一盆盆的蒼綠

十里洋場，光怪陸離
在摩天樓的陰影下
只有倔強的綠
給你生命的欣喜和賡續

把文化的根
扎入像珍寶一樣撿回的鄉泥
用真誠的愛呵護
砌成一座座被遺忘的豐碑
鋪成一幅幅被疏遠的壯麗（田思 1994：85-86）

不脫守護文化的根、文化保存的窠臼，雖時而故做豪語，但對在地人而言應該讀得出一絲苦澀。眾所周知，松、柏、山茶之類在野地

可以生長得相當高大的樹，一旦盆植，受盆体的限制，整體規模都縮小了，適合擺放在庭院裡。雖然它仍可以在姿態上爭奇鬥艷，但畢竟體積被縮小了。因地制宜，馬華文化在多元種族的環境裡，必然是混雜的；也必然和在地的生存境遇、生活方式緊密相關。那不止是現代境遇，更是少數的境遇。

我在2007年的一篇小文章〈馬華文學與文藝青年〉（《星洲日報》文藝春秋版，2007/09/30）曾以幾個世代的馬華寫作者（學生週報—蕉風世代、天狼星、文風社等）為例，論及馬華寫作者寫作生命短暫的現象。如同運動選手那樣，最好的歲月在青春，幾年的文藝青年留下了若干作品，此後人生便轉向其他軌道，即使晚年回首，重操舊業，也不過是餘光而已。稍後老作家冰谷（林成興）的回應文章〈可能重出江湖嗎？〉（《星洲日報》文藝春秋版，2007/10/29）更補充了稍早世代（30、40年代出生而活躍於50、60年代者）的類似情境，而這一補充，更直接把時間往上銜接到「有國籍的馬華文學」（1957年馬來亞建國）的起源點。換言之，建國這回事並沒有改善馬華文學的生存境遇，甚至可能讓它更糟，因為官方民族主義以國族融合之名壟斷了大部分的資源，文學和它相依為命的根（華文教育）一直在危機中求生存（黃錦樹 2006），華裔子弟國小後就學的，十之八九都選擇以國語為教學媒介語的國民中學，華文課的時數寥寥。而文學作為商品，又必須面對港台菁英與通俗文學（及影視）的多重競爭，因此它的讀者是非常有限的（研究者，同儕、文藝青年）。出版彷彿同時是書自身的死刑宣告，更別說那些出不了的，永遠躺在副刊雜誌的版面裡。因此和一般的商業社會不同，不僅不能靠寫謀生，連業餘都是困難的。不只沒有版稅，還得倒貼。¹我把這整體的情境稱為

1 今日仍然如此，據《星洲日報》星洲廣場主編黃俊麟先生告知，「一般而言，除非是有出版基金贊助了三千（台幣三萬元左右），作者自己再貼個兩三千，不然出版社的意願並不大。」而印量及作者、出版社及贊助者間的分配狀況：

（印量一般而言是）一千本。如獲社團贊助出版基金，社團拿兩百本，作者若沒貼錢，就以贈書抵版稅，一般是大約一百五十本左右，若作者自己貼錢，就拿回五百本，剩下的出版社鋪到書

盆栽境遇。因為客觀條件會直接影響到參與者投入的意願，更何況這沒有實質利益的志業也不易轉換為**象徵資本**（馬華作家沒什麼特別的社會地位，在商人政客眼中甚至還不如一般人，和傻瓜同屬一類），不過是苦澀的**象徵**（轉用廚川白村「文藝是苦悶的象徵」說），如果以味為喻，則是**酸**；以日為喻，則是**暮**。就寫作者而言，文學鮮少作為終生的志業，大多只是人生的插曲，屬於「年輕時的激情」——對不少人而言也的確是**年少輕狂**——的一部分。

而這種長期的狀態也直接影響作品的**體積**——最顯著的例證是，長篇乏人經營。和其他地區或語種的文學體制不同（尤其是和鄰近的馬來文學比較），在馬華文學裡，長篇小說不是主要的文類。因此評價馬華文學首先必須充分評估這種狀態：因長期的缺席或萎縮，長篇小說的功能是不是轉移到其他文類裡去了？或讓人進一步反思長篇小說的**功能**？換言之，那是個扭曲的、不具自主性（或自主程度極低）的文學體制。

彷彿只能就盆钵給予的空間、土壤的多寡來決定它的大小。相較之下，馬來人有**馬來保留地**³。因此也就在「有國籍的馬華文學」起

店，書能賣的話，就是這剩下的兩三百本的量；不能賣的話……哈哈，可悲吧！太久的不敢講，這十年來大概如此。

十年前可能更慘吧？作者搞不好是自資自編自印自送自賣自發行，純手工業。現在還是近乎手工業，只是有代工。
（2008/01/28電子郵件）

相比之下，在台的出版雖然讀者也不多（很少賣過千本），但至少10%的版稅，不但不必自掏腰包，一本書還有幾萬元版稅業餘收入。

或有人認為這樣的引述「過於主觀」，「應引述出版界的書籍出版及銷售資料，或正式的訪談資料。」一方面「出版界的書籍出版及銷售資料」並不易取得，而且也不盡可靠（可能有「灌水」的情況）；我透過認識的朋友（或者直接在出版社內部掌管相關業務，或者屬於該出版社的核心分子）直接的告知，我覺得更可信。因為從作家那裡得到的訊息也是一致的。這種狀況自大馬建國以來，一直沒有明顯的改善。

- 2 寡產不等於沒有，但值得一談的卻也近乎沒有了。另生產也不等於消費，閱讀人口選擇的是舶來品和大陸港台生產及翻譯的經典，少數讀者則閱讀英美的生產或翻譯。換言之，長篇小說的愉悅功能當然不會欠缺。
- 3 如果說「馬來人有馬來保留地」的說法過於一竹竿打翻一船人，對馬來人

源後不久（3、5年內）⁴，馬華文學藉著少數文藝青年的留學，移地台灣，覓其生機。（張錦忠 2003：135-150）相較於馬華在地，雖然人數少得多（一個世代，幾個名字），但作品有持續的累積（雖然是零星的）；且經由文學獎，讓馬華集體有連帶的曝光率。⁵在結構上也等於嵌入了台灣現代文學的場域。換言之，擺脫盆的囿限可能是脫離困境的方法之一。但相應的代價或問題在於，是否會有「失根」甚至衍生出政治忠誠問題？隨著去國日久，與國土的生活聯繫日益寡淡，故土成他鄉，他鄉成故鄉，人的屬性（譬如入籍他國）、文的屬性（馬華地方色彩淡去）都可能受到質疑：因為昔日以方言土語、地方色彩、此時此地的現實為其形式及內容的規範，以作為馬華文藝獨立（於中國）之保障的馬華文藝獨特性的規定，原就具有強烈的政治一

的呈現略嫌平板，接近官方樣板定義，沒有呈現出馬來人政治、社會階層等嚴重的分裂面貌，本文以「馬來保留地」為喻，針對的是一個總體化的對象，不管他們內部有多大分歧，憲法上規定在資源分配上他們是總體得利的。相應的，華人的內部分歧也很大，可是一旦涉及文化生產、華文教育，也立即被總體化了。這樣的論述並不排除馬來人內部是多元分歧的。至於阿米爾·穆罕默德(Amir Muhammad)是哪一種馬來人？他自然是開明的馬來人。但猶如台灣只有本省人處理兩岸政策不會有「賣台」之嫌一樣，華人異議分子常直接被指控是「種族主義者」。那他的「馬來保留地呢」？目前大馬的獨立導演頗不乏華裔，可是那些華裔年輕人基本上均走向類型電影，相當自覺的不碰「敏感問題」——一切的政治禁區。相較之下，阿米爾的「大膽」是很值得注意的，這是個人選擇的問題嗎？還是華人普遍比較「膽小」甚至沒有才能？一如比較華人與馬來人的文化生產時常見的結論：後者的規模和眼界遠非前者所能比擬。如果不談結構性的限制，對這樣的結果的解釋，就只能說華人「自己不爭氣」（此論調甚常見）。換言之，我認為潛在的集體象徵資本支撐了阿米爾異議的可能。他們方有資格「開明」。因此如果他也有所謂的「盆栽境遇」，和華人的也不是一回事。他的盆子大得多了，相較於後者的「我族」，他的可是「我國」，*Negaraku*。我覺得他的處境就如同馬來馬共之於華人馬共，所享有的正當性是「非我族類」所不能比擬的。

- 4 由是言之，旅台一開始就是與在地馬華文學並行互補的一個系統。另一個被國家切斷的系統是移居新加坡者，包含了建國後留在新加坡者，如苗秀；新加坡建國後到新定居工作者，如王潤華。
- 5 90年代後，越來越多從未留學台灣的文藝青年獲獎，或大學畢業後返馬工作者在台獲獎。儘管近年台灣文學獎貶值得厲害（字數縮減，獎金多年未調整，得獎作品水平參差），但大馬的文藝青年似乎百分之百的認真，當一回事，彷彿是一種文學身分證。

道德意味，它確是認同的標誌，是華人唯恐自身的忠誠被懷疑而為文學設下的限制。它限定了過去，對象是心向中國的僑民文學；但它同時也限定了未來，文學背景的**離境**。但那同時是虛構的門檻（必須一定程度的**寫實**），一旦跨越，文學的國籍身分就可疑了。這種限定可以視為精神上的盆栽境遇，劃框。80年代以來形形色色的馬華文學本土論都和它分享了共同的邏輯：不管被不被（國家）認同，絕對要毫不保留地表現出對家國無盡的愛與認同，**既使不被愛也不能不去愛**。⁶

總而言之，自有馬華文學以來，**困境**就存在了，形形色色的。不論是建國前還是建國後，彷彿已成為它的**屬性**的一部分。建國前**南來文人**的過渡性（避難者終究會返家，或因政治因素被遣返）及過度政治性（左傾，政治狂熱）、或中國傾向過重，有礙馬華文學**主體性**（時下的學術流行語之一）的確立；有**國籍**之後，種種客觀限制之外，再加上它被驅趕入民族的鐵籠內，華文已成書寫者族群認同的必要指標。（黃錦樹 1998；2006）在這背景之下，可以理解近年同時身為華—馬學的互譯者及馬華文學翻譯者的莊華興提出的**跨語說**（意即建議馬華作家以雙語寫作，最理想的搭配是兼用華、巫語，為的是解決新一代華人越來越少能運用華文，及藉以取得進入國家文學的許可證）⁷，在馬華社會該引起多大的反彈（或者反感）：它觸及了馬華文學困境與創傷的**切膚之痛**。這種解決困境的方案真能解決嗎？以下我用兩個近年的**跨語**個案來回應，都涉及大馬（華人政治）最根本的問題。一關涉愛國，一涉禁忌（馬共）。嘗試藉此探勘，是否異議本身即是禁忌，不論用什麼媒材什麼方式；也藉此進入不同的歷史航道——旅台與馬共。

6 關於大馬華人這種深怕被懷疑不認同的心態，及因固打制（編按）造成的創傷詳何國忠(2002)。

編按：固打制是馬來西亞的一種種族教育制度，指學生在進入大專時，除了成績的考量之外，並以種族來區分入學名額限制，不同的種族有不同的名額限制，當中又以馬來人擁有最多的入學名額。

7 我和華興針對此一議題的往復辯論見氏著《國家文學：宰制與回應》(2006)附錄的5篇短文。這在技術上不太可能。

二、旅台與*Negaraku*

2007年8月間黃明志偶然發生了*Negarakuku*事件。⁸

2007年7月旅台生黃明志的影音饒舌歌（rap短片）《我愛我的國家*Negarakuku*》在YouTube上發表，很快就受到大馬中文媒體注意，報導之餘詢問副文化與藝術部長，雖然官員表示如果涉及扭曲國歌將因觸犯法律而被對付云云，可是並沒有導致真正的政治迴響。然而當8月7日馬來文《大都會日報》(*Harian Metro*)跟進報導並大肆渲染後，情況就大不同了。從報導可以看出，反應激烈的高官們深覺國歌被詆毀、國家被冒犯了，並有破壞國民團結之嫌。（王德齊、楊凱斌 2007/08/08）而其罪名，著名的評論家李萬千在為黃辯護時，在其專欄中詳細地整理出三項，一、觸及國家敏感議題；二、戲弄 (*persendakan*) 象徵國家主權和尊嚴的國歌；三、沒有教養 (*biadab*)，使用粗話。（李萬千 2007/08/17）國家機器很快介入，研議該用什麼法條來對付這狂徒，是《國歌法令》呢，還是《1948年煽動法令》？8月10日麻坡警方召見黃明志父親，11日大馬駐台辦事處官員約見黃明志面談（《獨立新聞在線》2007/08/11），14日透過馬華公會副會長、衛生部長蔡細歷向政府及國人公開道歉（《獨立新聞在線》2007/08/14）。然而兩天後首相署部長納茲里(Nazri Aziz)表示，將以《1948年煽動法令》起訴黃，首相也表示和內閣討論過相關事件，認為訴諸法律有其必要（《獨立新聞在線》2007/08/16）。恫嚇、警告挑釁者，宣揚公權力的目的也達成後，結果卻不了了之。顯然政府也不希望把事情鬧大；當事人的公開道歉並表示不再犯就已是最好的下台階，未必告得成當然也是原因之一⁹。一般而言，此類事件有助於凝

8 *Negaraku*是指大馬國歌，同時指「我的祖國」這回事；*Negarakuku*一方面指黃明志的饒舌歌，也指我的「我的祖國」。本論文審查後，方讀到Keng We Koh討論黃明志事件的專題論文，該論文對旅台與華校均沒多少著墨。

9 饒仁毅律師研究了相關法條之後，表示前述兩法都無法將黃入罪。（《獨立新聞在線》2007/08/22）有人提醒，即使未必告得成，大馬政府有「內部安全法令」，可未經審訊長期扣留異議人士。他並建議補充下列訊息：

聚華社公共知識分子的向心力，菁英的公共輿論（除了官員立場偏向官方，以大人教訓小孩的語調批評當事人之外）幾乎都一面倒地為黃辯護，敏感的種族神經怕不免被挑動，多增加一個政治迫害的案例似乎並不明智。大驚小怪，以國家機器對付一介學生歌手，恐致國際觀感不佳（畢竟2007年是大馬觀光年）。也幸虧如此，對當事人而言只是虛驚一場；然而擺在大馬多元種族而一族獨大，政治敏感指數接近過敏狀態的大環境來看，還是很值得注意¹⁰。

嘲諷地說，相較於黃的影像與歌詞，馬華文學可從未受到過這樣高的待遇，受到高官甚至內閣的**青睞**。¹¹很顯然，這得歸功於媒體的力量，不止是新聞媒體的散播甚至煽風點火，也因為它是語音與影像的短片。這首饒舌歌在策略上衝著2007馬來西亞觀光年而來¹²，以偽廣告MV的方式呈現，一開始就是對「觀光年」諸廣告所宣傳的馬來西亞的現代、進步富足、多元文化、團結、一派歌舞升平等的嘲諷，剪接升平影像插入大便，以及自身所屬的單元國家教育之犧牲者的獨中生¹³泛黃的形象。且用了不少華裔閩南人常用的髒字，其意圖非常直接：文雅地說，是不平之鳴；「本土」一點的表達，則是「賭

2008年9月12日，《星洲日報》記者陳雲清、行動黨議員郭素沁、《今日大馬》(Malaysia Today)網站編輯Raja Petra Kamariddin同日被官方援引「內部安全法令」逮捕。在大馬的公共言論場域之險惡下，黃明志的全身而退可說是個異數。之所以如此，和他的在籍留台生的身分有沒有關連呢？

- 10 有趣的是，維基百科〈我的祖國（馬來西亞）〉詞條最後一部分即是此一國歌的「改編事件」，也附有事件詳細的報章報導出處。
- 11 犯禁的馬華文學（觸及所謂的敏感問題）不是沒有，但幸虧沒有被翻譯。
- 12 試想2007年2月間蔡明亮以吉隆坡為背景的电影《黑眼圈》遭官方以「反映大馬醜陋面不利觀光旅遊年」為由禁播（在輿論壓力下於3月間解禁，但需挨5刀且只許在吉隆坡、檳城、柔佛上映）。
- 13 編按：獨中生指就讀於華文獨立中學的學生，該中學是由馬來西亞民間華人贊助創辦的中學，是馬來西亞獨特的教育體制。馬來西亞華文獨立中學的政策就是肩負發展中華民族母語教育和傳承中華民族文化、培育民族子女等教育功能。但由於華文是非官方語言，華文中學在馬來西亞獨立後就全被改為國民中學，不接受改制的繼續稱為獨立中學，即反對馬來西亞國家教育語言及文化政策、也不獲得政府津貼的中學，在經濟上必須自力更生，成了民辦的私立教育體制。引自維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wiki/獨立中學>。

懶」、「訐譙」之聲。以這樣的策略，很難說不是挑釁。而且選擇國歌作為操作的對象，可以說觸碰到最敏感的部位，因為那是國家的象徵，本質性的崇高，身為國民，只能仰望。而國歌歌詞本身呢，既是祝禱，也是許諾。簡短的歌詞其實只有兩節八句，第三節的四句是第二節的重複：

Negaraku,
Tanah tumpahnya darahku.
Rakyat hidup,
bersatu dan maju.

我的國家，
我生長的地方。
各族團結，
前途無限無量。

Rahmat bahagia,
Tuhan kurniakan.
Raja kita,
selamat bertakhta.

但願上蒼，
福佑萬民安康。
祝我君王，
國祚萬壽無疆。¹⁴

黃明志的《我愛我的國家*Negaraku*》標題即是反諷。「我愛我的國家，但我的國家愛不愛我」是80年代以來華裔青年在華文教育一再面臨危機、馬來政客大言不慚地恫嚇、新經濟政策及固打制造成華

裔青年上升之路被阻絕的絕望感而造成普遍焦慮，凝結而成的一句控訴。80年代曾有大量的詩歌傳達了類似的感覺，愛，但不被愛，一種強烈的被遺棄之感。¹⁵而80年代的留台人，分享了同樣的焦慮，羅正文等《大馬新聞雜誌》的創辦，林福南、陳亞才等大馬青年社的設立，¹⁶都標榜對馬來西亞的關懷與愛，面對大馬的現實政治也充滿了無力感。而留台人，一般而言可粗分為兩條路，一是自覺的再中國化，強化民族認同與民族文化認同，甚至延伸向政治認同的變更，李永平、溫瑞安是最著名的例子（也幾乎可說是中華民國在台灣僑教政策的碩果，一定程度的接受了僑教政策的民主主義及文化宣傳）¹⁷；而對馬來西亞的政治認同，可能更具普遍性，尤其80年代後直接受到台灣本土化運動、解嚴的刺激，對比大馬境內馬哈迪(Mahathir bin Mohamad)時代新經濟政策及文化教育馬來化下造成的華裔邊緣化恐慌。在投注關於旅台社群處境的反省的同時，總是必然地會投射向大馬的「鄉土關懷」¹⁸。自60年代以來，留台生作為冷戰（反共）體制的一環，¹⁹不知不覺地參與了戒嚴台灣的菁英再生產，在台灣清楚

-
- 15 大馬的情況請參見何國忠(2002)，尤其關於馬大中文系師生的心態處境，他們有較多與國中生、循國家教育系統及受國家保護的馬來人有近身接觸的機會；近年類似的磨擦又在博特拉大學(Putra University)華文學會註冊事件上重演——以其為「單元語言組織」而不被批准。
- 16 《大馬新聞雜誌》以剪貼大馬報刊新聞為主要內容，可說是留台人關懷大馬的一個非常具代表性的個案，雖然它的壽命很短。林福南、陳亞才等創立的大馬青年社，1983年《大馬青年》創刊，1984年創社，1990年解散；而《大馬青年》斷斷續續的出版，1995年出了第十期後，至2001年方出版第十一期，第十二期的出版已是2005年。
- 17 僑教政策本是政治的產物，中華民族主義是其必然的思想基礎。關於1949年後的僑教政策作為一種政治策略，朝向「再中國化」的過程，詳范雅梅(2005)。
- 18 簡略的討論見范雅梅(2006: 9-12)；吳子文(2006: 82-85)。而不同時期台灣政府對僑生的處置，詳吳子文(2008)。前兩篇刊載於《大馬青年》的文章可惜均未充分展開，前者尤其需要廣泛的社會調查支撐。而90年代後，旅台大學生言論空間呈現的媒介也轉向網路，最主要的是創設於1995年的「大紅花的國度」：<http://www.hibiscusrealm.net/>。
- 19 幾個月前，60年代中期曾為台灣駐馬副領事的蕭萬長接受媒體訪問，對於相關過程有詳細的陳述，適可佐證：

一九六六年三月我被派駐吉隆坡擔任副領事，我們人數很少，到

可見的歷史演變裡——較大馬快速的現代化步驟和它的負面效應（污

了以後我被分配兩件重要工作，一個是簽證、領務，一個是與僑務相關的，與華人社團聯繫。我發現當地華人對教育很重視，這是中國人很好的傳統，總是希望下一代受更好的教育。

家境好的華人有一部分接受華人教育，在念完初中、高中以後就讓子女出國留學，大部分華人家境不是特別好，可是他們非常重視華文教育，但馬來西亞政府政策是只能念到中學，大學只有一的家馬來亞大學，根據它本土化的政策，它給土著民族三分之二的保障名額，三分之一才給其他種族的優秀生，因此大部分受華文教育的人，中學以後就無法升學，就流入社會。我觀察他們心裡很無奈，也有些不滿，變成共產黨最好吸收的對象，當時馬來西亞內部最大的問題就是馬共，馬共的猖獗構成它內部治安的隱憂。

據他們情治人員跟我講，馬共百分之九十九是華人，很多人中學畢業以後，也許無所事事，被吸收也說不定。我就跟領事張仲仁報告這件事，他也贊成我的想法。我們就找馬來西亞教育部長 Khir Johari、安全局長、首相署主任談這件事。我告訴他們對於馬共的問題，最好的解決辦法就是替華校畢業生找出路，政府不必花任何錢，只要准許他們到台灣讀書、進大學，因為這樣子他們一方面受了高等教育，他的家長一定會很高興。

當時到台灣受教育很便宜，台灣政府也可以給予優待，這些人就會願意去。台灣當時的社會還不是很開放，灌輸的思想都是反共意識的，所以當他們讀完大學以後更成熟了，心裡面多少會有反共意識，回到馬來西亞或到其他地方深造，都會變成大馬人才，對國家反而是有貢獻的，我說這個政策值得你們好好考慮。（童清峰 2008：54-55）

但從歷史來看，蕭談的情形還算是比較晚的，那時台灣僑教政策及建制已趨成熟，他的功能大概是促使馬政府對華裔學子留台不會橫加阻礙。而1949年後，在台灣經濟困難的時代重啟僑教政策，到底和美援脫離不了干係。毋庸諱言，美援僑生政策的擬定甚至早於馬來亞的獨立。韓戰爆發後，台灣的美援獲展延，且從1953年起在尼克森(Richard Nixon)訪台後建議美國政府支援招收僑生，此後的1954-1965年是為美援時期，前六年甚至有大量的資金挹注，台灣幾個最有歷史的國立大學，都大量運用了美援完成或補強基礎設施，美援下的僑生不只獲得全額補助，還有來回機票。而美援於1961年後逐年減少，至65年停止。但此後的僑生政策的整體建制（設備、獎勵等等），其實肇建於美援時期。陳月萍(2004)有頗詳細的整理。有一種倒果為因的說法稱是文革的緣故才導致大量華裔學生留台，但從歷史來看，文革只能說是在政策形成後的偶發事件，也許如此恰好可以給有心人遮蔽掉它的反馬共、美援背景。陳慧嬌(2006)訪談了不同世代的留台者，包括美援世代，約略可以看出彼時馬來亞華裔在留台與留中之間的角度。

染)及反思(環保議題等)、較明確的民主化(揭弊、政黨輪替)及科技的普及(電腦、網路的普及率)、較高水平的醫療、較均等的機會等等,一方面台灣向留台的大學生展示它(在各方面)的「進步」圖像,以與大馬較有限的「發展」對照;另一方面,台灣的公共空間及學術資源提供了更多概念工具和思想資源,可以援引去反思大馬的種種議題。步入學術界的留台人,部分提升了大馬研究的水平。但大馬的大環境其實沒有多大的改變。

大體而言,留台大學生的愛國情緒往往雜揉著對前途的不確定感,甚至惶惑。因為除了極少數(繼續升學、外聘、結婚)外,大部分留台生畢業後就必須返馬面對實際的就業問題,文憑的被承認與否,以及與大馬本地大學生及留英美澳日生的嚴酷競爭。在那並不很久以後的可預想的未來,也將領略種族政治造成的上升之路的局限。換言之,黃明志的《我愛我的國家*Negaraku*》裡頭呈現的焦慮憤怒與反諷,其來有自,不誇張地說,也有好幾個世代的累積。²⁰

於是我們看到在*Negaraku*之後接的是「我愛我的國家,有國才有家。」崇高修辭,雖然是陳腔。然後即轉入流調「有家才有我……」以榴槤為喻,雖愛用髒話,重點在於「裡面的真相」。好幾個都是非常普遍的日常經驗,首先是交通警察(*mata*)假借開罰單而半遮半掩的收賄(俗稱喝茶、喝咖啡)。接著唱了國歌第一段完整段落,而就在*Rakyat hidup/bersatu dan maju*(直譯:人民的生活/團結與進步)後,接以「這種現象,不需要改善。也不用加強,警民合作。一杯咖啡感情不會淡。……」因為這其實是「雙贏»,各取所需,民眾也不喜歡被開罰單(*saman*,俗稱「三萬」),但法制因此蕩然,徒然覺得警察只不過是為錢找麻煩。中間有一段有爭議的插曲,讓回教徒覺

20 無庸諱言,這種情緒部分可說是獨中生的意識形態(與華教[護教]運動者共享的,把種族困境視為一切困境的決定性因素)。若有人質疑本文所用之「盆栽境遇」是否也是這種「獨中生的意識形態」的結果,還是它的因?其實上下文清楚地道出是後者,「獨中生的意識形態」可說是對困境的一種防衛性反應,而防衛者精神上也必然受到困境的傷害。當然,這樣的境遇必然涉及基本人權問題(華團歷年的備忘錄有極充分的陳義),尤其是平等。

得被冒犯——把回教堂清晨的禱告廣播比擬為R&B、公雞並譏其走音破嗓，反映的是一般華人對回教堂密布而日日凌晨高音喇叭完全不顧非教徒感受的強勢播放的反感。而後涉及「不要怪 政府只會照顧土著 / 不要怪 我們沒有受到公平照顧 / 這樣才能證明我們華人不怕吃苦 / 這樣才能訓練我們逆境找出路」，「不要覺得他們的標準很奇怪 / 因為這樣反而表現我們 很厲害」也是華人常見的自我調侃，苦澀卻不乏自勵的意味。譏諷馬來人因此無法斷奶後，接著是國歌完整的第二節（祝福君王），再下來吐槽政府部門辦事的烏龜效率及老大心態，尖銳的對比。這些都是大馬華人日常的抱怨。最後歸結於「獨中生畢業了 要進Local大學西北難 / 其實這件事情我們更不需要賭懶 / 這其實是政府的一個更偉大的計畫 / 他要我們到處跑 出國自己找希望 / 然後學習東西回來報答國家」²¹扣回前述的愛 / 不愛的主題，「2007馬來西亞搞觀光 / 華人文化統統拿出來宣揚 / 獨中生政府根本不想管 / 文憑丟去longkang（按：水溝）……」敘事者和大多數獨中生一樣，只能選擇留台，在街頭吟唱，自謀生路。在觀光年慶賀的煙火裡，仰望泛著藍光的雙子星塔，Raja kita selamat bertakhta的歌聲顯得非常苦澀，這種苦澀是邊緣化的族群非常熟悉的。華人傳統文化既是妨礙國族融合的要素，卻又是大馬多元文化不可或缺的一環，在面對觀光客時尤其顯出它曖昧的附加價值。為什麼這會引起大多數華人的共鳴，其實很清楚：這都是大馬華人日常生活**此時此地的現實**（包括對不同種族的嫌惡，宗教的、生活方式上的）。而這種負面意味（家醜外揚）的表達，自然會被視為對國家集體意志的挑釁。

有趣的是，這其實是一個很鮮明的**馬華文藝獨特性**個案。如前所述，有**此時此地的現實**，有**方言土語、地方色彩**：《我愛我的國家*Negaraku*》中的語言夾雜著馬來語（國歌及單詞mata、longkang等）、華語、閩南語（「麥驚」、「鼻坑」、「欠幹」、「賭懶」、「西北夠力」、「西北爽」等），而畫面是所有在地人都熟悉的，有

21 這部分近年在大馬華文報章有關於「立錐無地」的一番討論，及旅台的廖宏強醫生(2007)的苦澀不堪的回憶，因一心想回鄉服務致迄今兩頭不到岸。理想主義者尤其會吃盡苦頭，因為現實畢竟是嚴酷的。

限的歌詞只需字幕上的翻譯，即是跨語了。三大族群都看得懂。馬華文學長期面對的指責之一——受困於一己民族——似乎獲得局部的解決。而寫作上語言的在地色彩（融合方言土語以構築異於中文的華文及相關的困難）（黃錦樹 1998：53-92），方塊字面臨的轉化困難（只能把馬來語及方言詞彙音譯），影像產品可以直接存音，文字只附屬於畫面及語音。黃明志另兩部短片也可作為例證。遊戲意味甚濃的《我的朋友》(*Kawanku*)較全面地展示大馬華人的複雜語言情境（雖然客家話、福州話均缺席，潮州話也不多），分三節，三種友誼情境。第一大節從一開始的幾句海南話，轉向廣東話，以方言群間的方言心結為矛盾點，尤其是南馬（閩南語人居多）與中馬（以廣東話為華人日常溝通語）的差異；中間一段用華語，又轉向批評新加坡過度嚴格的政府管制，及兩地間華人互相的輕蔑，這又是南馬與新加坡之間因鄰近、因往來密切而特有的矛盾。第三節以馬來語唱，馬來政客的慣用語「cina balik cina」（支那人滾回支那去），華人的回嘴「kalau semua balik ah/saya takut mana kamu pergi cari kerja/.../semua masuk hutan/hidup macam sakai……」（如果全部華人滾蛋了/你們到那裡找工作去/……/全部回到森林去/過得像原住民沙蓋一般）相當準確地再現華人間、與近鄰間、友族間的日常成見，這都是以文字為主、以紙為載體的文學長期難以克服的。因此馬華現實主義一直難以兌現它的許諾：離此時此地的現實總嫌隔了一層，方音和漢字的形體間也有種一種曖昧的*kawan*（朋友）關係。

可是問題還是存在，這種rap的規模畢竟太小，表達也太直接了，極限非常明顯。而且其所關係的現實，也都直接取材於日常成見，其下者甚至落於粗俗（部分是緣於此一類型本身的文化傾向）²²。但《我的朋友》與《我愛我的國家*Negaraku*》兩個短片，

22 譬如《麻坡的華語》就偏於粗俗。雖然前舉二片偶見粗話，但並不如此頻密。青少年次文化（被中產階級稱為三星〔流氓〕文化）誠然有此傾向，但似乎不足為訓，也不足以代表馬華。就論題而言，《麻坡的華語》呈現的現象於馬來西亞各小鎮均類似，華人小鎮華語的雜語狀況（地方性）也大同小異。

也許無心插柳地尖銳觸及大馬華人的心態與處境，但跨語造成的政治效應，卻弔詭地凸顯了以華文表述的馬華文學，語言雖作為溝通的阻隔，但卻不啻是一種保護：蔑視中文的人看不懂，因而得以免於迫害。²³但仍可以清楚看出，那是我族的重演的憤懣；愛與創傷。限於形式，這一表述的表層（可見的）就幾乎已是它的全部。*Negaraku*在這樣的脈絡裡如同一曲反諷的哀歌。

三、《最後的馬共》

接下來要討論的馬來導演阿米爾·穆罕默德 (Amir Muhammad) 被禁的紀錄片《最後的馬共》 (*The Last Communist of Malaysia*, 2006, 一般譯為《最後一名共產黨人》)，這觸及了馬來西亞國家政治禁忌的核心之一。馬共，那是一群不唱 *Negaraku*、反對馬來西亞計畫，但認同馬來亞的人。

2006年12月馬來西亞新聞部長公然批評華人建在墓園裡的抗日紀念碑是紀念共產黨的，而馬共是國家的敵人；隨後森美蘭州 (Negeri Sembilan) 州務大臣更發出警告，要求拆除孝恩園的紀念碑。更早的5月間，阿米爾·穆罕默德所拍攝的兩部紀錄片《最後的馬共》和《村民，你好》 (*Apa Khabar, Orang Kampung*, objectifs film, 2007) 遭官方以「歷史不正確」（再現的歷史不正確）查禁，而《最後的馬共》被禁的原因之一據說是「陳平是華人」。²⁴

而關於馬共，自馬來西亞建國以來，作為敗的一方，潛入了森林，同時也遁入歷史的迷霧裡。自30年代以來參與反殖、抗日鬥爭的歷史被淡化了，被強調的倒是它的血腥形象：暴力、暗殺、反叛，也被官方視為歷史的禁忌，更被族群化——與華人的不安分連結。它

23 雖然，據我個人的經驗，華文報章雜誌的編輯都具備相當的政治敏感度，觸犯禁忌可能引發負面政治效應的題材（尤其事關回教、種族圍打制、馬共等）一般都不會被接受。

24 請參見《獨立新聞在線》(Merdekareview.com)。

最大的歷史紀念碑，其實不是形形色色的抗日紀念碑，而是華人新村，活的歷史紀念碑。1948至1960年間馬來亞的緊急狀態，英殖民政府為有效阻絕郊區華人對馬共的後勤奧援而把50餘萬人遷入新村集中管理，即使緊急狀態結束後新村還是自然延存，成了獨特的華人社區。雖然監控與圍籬解除了，但它一貫維持它低度發展的樣態（至少到80年代），成為下階層華人的聚落。新村的在，它曾經存在的歷史與政治任務（竟是有效），它們的破舊荒涼、單一族群、人工，以物質的形式強有力的見證了歷史：華人與馬共。更別說那些馬共成員的親屬，甚至暴力衝突過程中犧牲者的親族，記憶也一貫的隱沒。不用說，那既是禁忌也是創傷。即使那並不是很久以前的歷史，但似乎也僅屬於那幾個世代的人，對在馬來西亞建國後經濟安定種族政治下成長起來的人來說，就像上古史那樣邈遠。雖然80年代以來有少數華文小說以此為題材，嘗試捕捉那隔代的光影。²⁵不用說，那只能是創傷，或想像的創傷，多少投射華人在新經濟政策下及文化壓迫下的哀思，馬共不過是文學隱喻。

而真正的馬共到哪裡去了呢？自1989年與馬、泰簽署和平協約後，被安頓在和平村的殘存部隊，逐漸出土了，變得可見。還活著，就表示最老不過是祖父、曾祖父輩。而近幾年間，陸續有不少馬共回憶錄出版，其中的高潮或許是馬共領導人陳平的《我方的歷史》(*My Side of History*)²⁶。由於頭腦仍清楚、身體仍硬朗的歷史當事人的現身，對馬共歷史的認知，甚至對馬共在馬來亞建國史上的定位，可說是進入不同的階段。由垂垂老矣的歷史當事人向大馬官方及昔日的殖民母國爭辯歷史真相，這大概可以說是馬共倖存者的最後的戰役。

25 從小黑〈細雨紛紛〉(2008)、梁放〈鋅片屋頂上的月光〉(2008)、黃錦樹〈魚骸〉(1997)、張貴興《群象》(2006)、黎紫書〈國北邊陲〉(2008)、李永平〈一個游擊隊員的死〉(2002)等，都以內部聚焦的方式把馬共議題創傷化。

26 原文是英文，陳平口述，由伊恩·沃德(Ian Ward)與諾瑪·米拉佛洛爾(Norma Mirafior)整理，2003年由新加坡Media Masters出版；中譯本2004年由同一家出版社出版。另可參考C.C.Chin & Karl Hack(2004)。關於馬共回憶錄或訪談，我的收集並不齊全，詳引用書目。

「我方的歷史」這一標題極準確地道出問題的實質：歷史的構造離不開述史者的位置與觀點，因此有一定的相對性、主觀性。而他們畢竟位於歷史的內部，當他們隱遁時，歷史已被官方依其國家意識形態的需要而寫定。而馬共一向策略性地被官方和華人劃上等號——實質上它有若干馬來人和印度人成員，但整體而言華人居多數——在這樣的背景下，非華裔、非歷史當事人的阿米爾去處理馬共就是一件值得關注的事，這行動本身似乎就跨出了族群的刻板印象。

如果就《最後的馬共》而言，明眼人其實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它並非一般意義上的紀錄片，「半歌舞形式的紀錄片」(a semi-musical documentary)形式活潑，略帶諧謔色彩。雖然影片的字幕（中、英文），以索引(index)的方式引導影像流動，譬如第一個句子：

Chin Peng was born in the small town of Sitiawan in 1924.

陳平於1924年在實兆遠出世。

這是《我方的歷史》第二章「我於1924年10月21日，出生於霹靂南部，離怡保大約50英里的實兆遠鎮，……」（中文版頁18；英文版p.31）的濃縮版，轉成第三人稱，補上「Sitiawan is a very Chinese town / 實兆遠是個傳統的華人城鎮。」其後的畫面卻是一位和善、缺了顆門牙，賣挫冰的印度青年以馬來語敘述Sitiawan名字由來的軼聞（死像）及他體面如侍者的制服、他們家族在當地的簡略歷史（割膠、砍樹……），幾分鐘全然的離題——全然無關乎陳平和馬共，只有地點上的關連。這即是這部片子的手法和基調。只有字幕的文句緊扣《我方的歷史》中陳平一生移動的軌跡，而聲音和影像往往背叛了文字。在第二個敘述句「他們家是做腳踏車生意的」（英文省略）後，接下來的幾分鐘是一位華裔腳踏車店年輕老闆詳細地介紹腳踏車的品牌、價位，宣揚騎腳踏車的好處等等。隨著影片的展開，字幕的沈默敘述伴隨畫面與聲音的離題。於是有一段印裔拖車司機以閩南話敘述他的失學及娶老婆的困擾（實兆遠）、華裔柚子西施以廣東話介紹她的美柚（怡保），太平地方文史工作者以華語詳述「花包」的由來、木炭業老闆以英語非常詳細地介紹高級木炭的生產過程（怡保）、山裡的臭豆採集與馬來臭豆小販以馬來語推銷臭豆

（美羅）……這些都是離題甚遠的，唯一的關連常不過是地名（非現場），現身的人既與馬共無關所談也無關乎馬共，馬共的歷史彷彿在他們現身的日常的遙遠的背後且消失殆盡，與他們當下的生活無一絲一毫關連。語言上的多元混雜、聲音與影像直接的再現力與感染力，充分展現了電影媒介的長處，那也是文學作品夢想而做不到的，跨語，也自然跨族。然而除了這些無關連之外，畢竟還有相當的片段關涉標題。其一是歌舞片的部分。「紅土坎·霹靂·1938年7-8月」字幕寫道那年14歲的陳平在紅土坎住了一個月，閱讀馬克思主義，決定加入共產黨。隨後是一段馬來歌舞片，歌詞內容嘲諷模仿了共產主義的自我宣稱與宣傳，嘲諷的意味相當明顯。其二是丹茸馬林師訓學院馬來姑娘對馬共的批評，「暴力、偏激、欺負弱小」，很接近官方的定論。

約莫片子的後半部，「和豐·霹靂州·1948年6月16日」、「某日清晨，幾名馬共在園坵暗殺了3名英國園主」後（即《我方的歷史》第十四章），離題的情況變少了（雖還有穿插嘲諷意味的歌舞）。那個歷史時間，正是馬共轉向武裝暗殺的激進路線、英殖民政府宣布緊急狀態的時刻，也是馬共被迫遁入森林的關鍵點。那個叫作雅菲園坵(Ladang Elphil)入口處的遺址出現在書中（中文版頁192-193；英文版pp. 216-217）也出現在影片裡，影片中受訪的印裔園坵女工的話多少解釋了之前的畫面何以選擇離題：大部分（可能的）受訪者所知有限，無可談者。即使就在那歷史故址上出生、生活其間的亦然。隨著影像畫面的前進，暴力是馬共此後的形象，於是退休的歐裔園坵經理，新村的畫面出現了：種族隔離；被引誘加入的馬來人兼警方的線民暢談受命誘捕馬共、獲利頗豐的往事。這都已深入主題。被往馬來半島北方森林驅趕的馬共，不久即徹底離開了群眾的生活，被困鎖在自己的世界裡。而其中有一個片段極富文學意味：導遊帶領觀眾進入昔日馬共的藏身處，幽暗的洞穴裡，洞壁有幾個筆劃不清晰的中文字及一幅頗清晰的裸女塗鴉。《我方的歷史》中崇高的革命立即被降格，影片的嘲諷意味到這裡達到頂點。苦悶無聊的森林生活，他們自己的牢獄。那些男人，那些戰士，在百無聊賴的日子

裡，想女人，玩自己的生殖器。接著最後的段落場景已跨出馬來西亞的國土，進入泰國。「勿洞(Betong)·泰國，1953年末—1955年中」昔日的根據地，繳械後的和平村。最後的段落（將近20分鐘）聚焦於最後的馬共們，傳說中的暴力殺手終於出場講述他們自己的故事。那些中年以上的華人男女，也不過是些尋常百姓，和馬來西亞一般小鎮上的華人沒什麼差別，作小生意、唱卡拉OK。批評往昔某些手段上的過錯，只是不免強調他們的反殖反帝，對馬來西亞的獨立有一定的貢獻。自我定位，我方的歷史。依舊嘲諷的是，他們已是泰國觀光事業的一部分，成了觀光客觀看的對象（觀眾的目光追隨導遊）。他們的剩餘價值，也是生計來源。而馬來西亞歷史呢，早就順著自己的軌道往前走（因此影片結束於國慶歡快的煙火，*Negaraku*！）他們早就被棄置在歷史的彎角裡了。由是觀之，片名《最後的馬共》何嘗不是反諷？²⁷而讓陳平本人這位尚未過世的歷史人物從頭到尾缺席，其中的批評意味更不言而喻。

而反諷不止來自影片及片名，而是現實本身。無怨無悔選擇的道路，其實在馬來（西）亞獨立那一刻就失卻了大半的正當性。彼時

27 相較之下，同一導演的另一部紀錄片《村民，你好》則是更為親切的問候，該片直接進入主題。也許原因在於該影片聚焦的是蘇吉林和平村（第十二朱拉蓬公主村），那裡以馬來人居多，看起來是個相當典型的馬來村莊（所有的馬來要素一應俱全），隨處可見的孩子、回教徒的裝扮、鬥雞及零碎的日常生活。但裡頭住著阿卜杜拉·西迪(Abdullah C.D)，馬共的黨主席之類的大人物。常出現在畫面上的是馬共中央委員阿郎·卡欣(Alang Kassim)，畫面且不吝打出字幕向其致敬，溫馨的調子，不乏民族情感因素。

審查人對《最後的馬共》的解釋（尤其是對陳平的缺席）和我的解釋間有較大的落差，譬如他說「影片對陳平是敬重的，至少對陳平的歷史，影片引用的是陳平的回憶錄。」我看到的是陳的回憶錄的「引用」不過是藉以勾連一連串的離題而已，對陳平患了瘧疾的歌舞嘲弄最為直白；而對馬共回憶錄中最強調的抗英根本就沒什麼著墨。至於說「影片是否也在幫陳平抗議，因為官方阻撓，他回不了家？」我覺得更牽強，如果真要幫陳抗議，至少拍一下他父母的墳墓吧——陳平申請返馬，不就是為了到父母墳前上個香嗎？總而言之，此片的無辜被禁及阿米爾作為異議分子誠然可敬，但不能據此移情向影片的解讀。缺席可能有不同的功能，是崇高還是卑微，還得看呈現出來的部分而定。

「反殖」的歷史任務可說階段性完成了，剩下的國體上的爭議：一個怎樣的馬來西亞？而放棄議會路線，一定程度上也即是退出歷史現場，不再參與大馬的未來。²⁸森林成了最後的舞台，竟也和大馬華人的文化（精神）表現一樣，成了盆栽；和平村作為最後的歸宿，反諷地作為昔日華人新村之鏡像；由是觀之，《最後的馬共》最後以和平村的景象曲折的再現的其實是大馬華人一般精神困境。²⁹最新型態的

28 並不令人意外的，馬共最高領導者如陳平簽署和平協約前的28年是在北京度過的，而非在森林苦熬。而陳平的自傳坦承和中國的緊密關係也證實了英國人及馬來西亞政府對馬共作為中共馬前卒的疑慮，這都是東南亞華人國家認同上的原罪。

29 若有人以二戰後馬共得到「大批馬來人的支持」為例，認為我採信官方說法（馬共＝華人），我覺得以下的說明是必要的。

馬共中的馬來部隊，馬共中委拉昔·邁丁(Raishid Maidin)、阿布·沙瑪(Abdul Samad)、應敏欽等的回憶錄、相關訪談，Mohamed Salleh Lamry的《馬來西亞：馬來左翼運動史》（謝麗玲譯，吉隆坡：策略資訊中心，2007）都多有陳述，也強調了馬來人部隊在馬共反殖鬥爭中的功能。值得注意的是，它們的系譜建構迥異於華人的馬共系譜，一方面強調是20年代末受印尼影響而逐漸發展起來的馬來左翼運動，其高潮為1945年10月馬來亞馬來國民黨(Parti Kebangsaan Melayu Malaya, PKMM)的成立，其後與馬共的合作，並在1949年成立了由阿卜杜拉·西迪領導的馬共第十支部隊，參與了許多抗爭；再則是強調和彭亨、霹靂等邦馬來人皇室本身的抗英傳統的縱的繼承（尤其是和皇室有親戚關係的阿布·沙瑪）。這都是反殖的本土的正當性譜系。針對審查人的質問，本人有以下三點答辯：

一、於是馬共＝華人的圖式應是馬共＝華人＋馬來人（其實還有若干日本人）。但如果從正當性論述來看，會變成馬共＝華人（沒本土正當性的）＋馬來人（有本土正當性的），從這圖式更可以理解大馬官方操作的微妙，其實是這樣的圖式：馬共＝華人＝不忠誠的外來叛逆者，反之，馬來人的反抗有其本土的正當性，不因為他們是馬共而被褫奪。如果從部分馬來左翼要員後來成為巫統重要幹部（穆斯塔法·胡先〔Mustapha Hussin〕，哈斯努·哈迪〔Hasnul Hadi〕等）來看，「親共和左傾的馬來知識分子一直都在」（審查人言）的情況讓問題更顯得複雜，馬來馬共和政府高層間的關係比華人馬共複雜得多，很難說沒有「自己人」的邏輯在運作（譬如，相較於陳平不得回鄉掃墓，首相馬哈迪1989年親自批准知名女馬共、女權主義者珊西亞·法姬〔Shamaiah Fakeh〕全家從中國返馬定居）。他們或者作為建國先驅而被容忍，甚至可能本身即轉而在體制內。因此可以說，在官方的圖式裡，其實並沒有否認馬來反抗者，他們說到底是自己人，可以不看成馬共。阿米爾的《村民，你好》和《最後的馬共》命題及影像呈現上其實精準地凸顯了這一層差異，前者是老鄉、長者而後者無論如何是異己。

新村，在國土邊界之外。那近在眼前的*Negara*（家國），曾經被他們否定也否定了他們的政體，主客易位，有國難歸。即使曾經擁有身分證（尤其是陳平申請返鄉掃墓屢屢被拒）；歸去也難免與群體脫節（30、40年的遠離）。在實質及象徵意義上，他們已都被推至歷史之外，成了剩餘物。

如果拿大馬TV3的馬共紀錄片《綠色叢林、棕色卡其：馬來西亞對抗恐怖主義》(*Jungle Green, Khaki Brown: Malaya's Fight against Terrorism*, 2007)和阿米爾的馬共作比較，更可以發現二者的差異。譬如前者大量運用馬共風起雲湧那年代的圖像（包括剪報）檔案，但後者基本上闕如。前者大量的運用參與剿共的英殖民官員及馬來警察的證言，後者也幾乎沒有。離題一度成為它的主題。相對於前者從馬共與馬來亞這樣的整體聯繫，以從30年代到建國這樣的時間縱深來鋪陳；後者也顯得過於缺乏歷史細節（用濃縮的陳平的自述簡略地帶過去），凸顯的反而是拍攝時的時間性。但兩片間還是有視域融合之處：都一定程度聚焦於緊急狀態及其效應。如果說緊急狀態是前者理所當然的主題，在後者，連接了馬共今日的現實：緊急狀態中的恐怖活動成了馬

二、審查人指控我援用官方說法談馬共（也許因為我指控阿米爾不自覺的重複了官方觀點），以馬共＝華人的圖式來隱喻華社的精神處境。其實中間有一個重要的中介是新村。緊急狀態下的新村計畫把馬來鄉村排除在外，明顯是衝著華人而來。政治暴力的行使基本上是依馬共＝華人的圖式來展開的，那正是我論點成立的基礎。參照馬共回憶錄，1948年6月20日以後，一直到1958、1959年的十年間，因新村計畫有效的阻絕了華人馬共的糧食補給，致使華人馬共遭到毀滅性的打擊，被打死餓死或被捕，而走向潰敗，人員大量流失，而倉皇北撤。相較之下，馬來人的部隊的北撤則優遊從容得多，因一路上有馬來鄉村的補給，也因此倖存的馬來馬共顯得特別多。

三、審查人反問說，「是否可以說，馬來人的和平村，反映的也是大馬境內馬來人今天的精神處境？如果是，他們和華人有何不同？如果不是，為什麼他們不回家？」其不可及不同的理由，如上述。相較於華人馬共作為歷史的剩餘物，馬來馬共則是國家神話必要的補充。他們的存在於功能上甚至可以覆蓋前者。而為什麼他們不回家？《村民，你好》中阿郎·卡欣對訪談者問的同樣問題做了最合乎人情的回答：「我們老了，這裡住慣了，老朋友都在這裡，回到離開已久的故鄉，反而不自在。」以他們的本土正當性，以大馬種族政治，在未來的歷史裡，如果他們被神聖化，也一點都不稀奇。

共的歷史定位。相較而言，馬共的成員的回憶錄大多努力強調他們在反殖抗日方面的貢獻——這在官方的歷史版本裡必然是淡化處理的。功過相較，很顯然地，恐怖活動被認為抵消了曾有過的貢獻。

雖然《最後的馬共》給和平村的華人將近25分鐘的時間，讓他們現身說法，反駁政府「恐怖分子」的污名，及重申彼時是爲了去殖、解放馬來亞，是爲了人民而戰鬥，但其實也只能流於表面（看起來不過是立場上的爭辯），因爲歷史當事人的過去並沒有被呈現。這一點尤其和《生命如河流》（邱依虹編 2004）的訪談作比較，就可以清楚的看出。數十年游擊隊人生中，呈現在二十來頁的文字中的回憶，有理由相信是最深刻的記憶。向過去的連接，指向他們童年、青少年時代的氛圍，一個世代的情感結構：殖民地馬來半島英殖民政府對華人的疑忌，以及對被殖民者的剝削，日本南侵的強暴、殺戮、檢證……，黑暗而無望的時代，甚至在16位被訪的案例中，有若干個案有地緣的因素（中北馬），或在重男輕女注定被犧牲的家庭裡爲自己找一條殊異的人生之路。或者知識青年因時代的刺激而有著較早的政治醒覺；有若干個案的父兄輩都是先行的革命者，或一家數口加入革命的行列。有人戰死有人被遣送回中國。離家愀心的無聲告別，往往與親人等同永訣。走出森林時上一代的親長大多亡故了，深刻的傷痛銘刻在兩代人的情感結構裡。受傷、挨餓、背叛，死裡逃生。其中最難堪的大概是被指控爲叛，如蒙月英的經歷，第一任丈夫「被派去做敵人的工作，可是後來卻被指控爲間諜，被處決了。」（邱依虹編 2004：199）因爲感情深厚，就變成了動人的憾恨。她說：

我的丈夫並沒有被平反，領導一直堅持說他是被派來滲透我們的。我問他們有什麼證據，但他們什麼都提不出，老是說他有罪。他帶來的一群年輕人又勤力又能幹，最後整群人都被處決了。

我認爲他是無辜的……直到現在，我仍然相信他不是我們的敵人，我很瞭解他。（邱依虹編 2004：200）

這大概是對信仰最嚴酷的考驗，也是革命團體常見的內部暴力形式。被陳平稱作「可怕的審判」，由馬共北馬局發動，也導致馬共的分裂。《我方的歷史》第二十八章〈森林諜影與駭人的審判〉也述

及這段歷史，也承認是歷史的錯誤。³⁰因此，蒙的傷痛便是陳平「我方的歷史」之下的「我方的歷史」，「解放馬來亞」在這樣的敘述背景下就不再是抽象的，而是有著不可彌補的遺憾。又如同書中馮蘇瓊（許寧）的回憶，難忘的事、快樂的事、「常夢見林東死去的妹妹」……這些內部視角的敘述帶著強烈感性的印記，也最接近一般人的體驗結構。相較之下，阿米爾的《最後的馬共》因為採外部視角，雖然形式富麗，但底子還是冷漠的（《村民，你好》相比之下有人情味得多了）。差別也許在於介入的態度。《生命如河流》的採訪者自言她父親是那種運動的參與者，也是新加坡白色恐怖的受害者，也飽受創傷後遺症之苦。因此到和平村去採訪，就是迂迴地瞭解她父親沈默與恐懼的緣由，因為他們有著共同的時代精神狀態。（邱依虹編 2004：38）他們是她真實的父輩，不是那被污名化的歷史存有。

而馬華馬共題材短篇其中最主要的介入方式，也是嘗試借用歷史當事人（革命參與者）的受創，在情感上有創傷，以哀悼歷史。寫於和平協約簽署前的，如梁放的〈鋅片屋頂上的月光〉（2008[1986]）含蓄地寫了為掩護參與共黨活動的情人而燒掉宣傳品因此被軍警處決的女老師，學生（敘事人）對她遙遠的追思；十多年後，李永平的〈一個游擊隊員的死〉也寫了兩個參與游擊隊活動的老師，男的後來投降出來，女的大概在肅反活動中慘死在森林裡。小說中一句「這群反對英美帝國資本主義的熱血青年，有好多是我的老師和同學哪！」（李永平 2002：164）把敘述者變成當事人，而不僅僅是個旁觀者。而森林裡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小說付之空白，只能確定其中有背叛、投降、殺戮、屍骨——也許也有悔恨——但或許只有當事人可能知道真正發生了什麼事。而發生的那些污穢殘虐的事，也許早已是人類長遠流傳的敘事作品裡的母題（如張貴興《群象》或黎紫書〈山瘟〉裡審美化處理的），或《生命如河流》點到為止所述及的。

30 又《星洲日報》「林裡林外」系列二「馬共一黨三分內幕」、「各打50大板·解決歷史分歧」中，馬列派領導人張忠民對相關事件有一番批評，對陳平事後的處置也不無微詞，因事發時陳平及其他巨頭均人在北京。（完整系列見2001年4月4、5、6、8日的報導）

四、結語

這兩個個案都可以清楚看到影像（及聲音）似乎比文字更有力量，更易於吸引觀眾，它有自我說明，頂多加上簡略的字幕、聲音；跨族、跨語都是輕而易舉的事。或許也因為這樣，在一個較敏感、官僚的社會，它們比純文字更易引發政治上的效應，即使內容本身無傷大雅，或不過略帶挑釁。就長處而言，新的媒材也許較有助於馬華文藝克服語言上的馬華文藝獨特性的困境，突破族群意識與國家意識形態的封鎖，而走向國際；但同時卻必須正面面對政治檢查機制，與極右媒體的監視。

而大盛於1960年後的大規模留台，其實也是讓較貧困的華裔子弟有個**似真的**上升之路的替代設施，以緩解華裔青年對馬共或左翼的想像。華教的意識形態，有了個右翼的出口，去參與誇大不實的中華文化的現代號召；資本主義現代化生活，準中產階級的未來，都是頗吸引人且務實的未來的許諾。雖然仍必須接受非我族類的現實考驗及台灣文憑長期不受大馬政府承認的情況。構成大馬華裔社會菁英中堅的留台人，同時是華社的文化菁英，華教意識形態的守護者，總是持相對保守的政治態度。

就文學史而言，1957年前後從大陸經香港（或加上台灣，如白垚）輾轉到馬來亞的馬華現代派先驅，余德寬、方天（張海威）、黃崖、姚拓、白垚（劉國堅）在馬組成友聯社，辦《蕉風》、《學生週報》³¹提倡的是與彼時位居主流的馬華左翼文學對立面的文學。以自由主義為基底，接引左翼之外的世界文學思潮，³²與香港的友聯社目標一致，現代主義是其核心之一。而在政治上，它們和國民黨及韓戰後美國的東亞戰略應是難以切割的³³。那是有國籍的馬華文學之起

31 相關細節參姚拓的回憶錄《雪泥鴻爪》（吉隆坡：紅蜻蜓出版有限公司，2005）第五章〈馬來西亞變成了我的故鄉〉首三節。

32 白垚近年出版的回憶錄《縷雲起於綠草》（雪蘭莪：大夢書房，2007）提供了若干當事人的回憶。

33 關於馬來亞友聯社的母體，香港友聯社及《學生週報》的原型《中國學生

源，是對30年代以來馬華左翼文學最強有力的抵制，雖然嘲諷的是這一批晚期南來作家據說因政治原因無法取得大馬國籍³⁴。這股對左翼的抵制力量，就政治效果而言，和華教的意識形態（對中華文化、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的認同）是一致的，也接近50年代以來台灣的主導文化。因此順理成章的，在其延長線上創造了數十年的留台菁英及旅台馬華文學，後者且與台灣文學接軌。如果說這數十年來，因此而有了規模不大的旅台知識社群、留台文學，那小小的自己的園地，在國土邊界之外。那豈不也是個新村？雖然並沒有實質的邊界，但其他性(otherness)總不難被辨認、指稱（一如我們之常被戲稱為「馬來幫」）。

如果說留台是革命幻想的替換，那是否也是個脫離盆栽境遇的契機？還是說不過是換了個較大的盆子？或者不過是讓根從盆孔中鑽出來，爬伸得遠一點而已？能否跨越*Negaraku*的魔咒？

引用書目

一、中文書目

無作者，游礫譯。2007。《伊斯蘭·馬來人·共產黨：阿卜杜拉·西迪·拉昔·邁丁、阿布·沙瑪訪談錄》。吉隆坡：策略資訊研究中心。

Lamry, Mohamed Salleh 著，謝麗玲譯。2007。《馬來西亞馬來左翼運動史》。吉隆坡：策略資訊中心。

Fakeh, Shamaiah 著，林雁譯。2007。《珊西亞·法姬回憶錄》。吉隆坡：策略資訊中心。

Maidin, Raishid (拉昔·邁丁) 著。2006。《從武裝鬥爭到和平：馬共中

週報》，有論者頗以其美援、反共背景為然，但香港的研究者頗有說服力地指出它「在不斷求變、緊貼時代的呼吸中，體驗了與香港青年人憂戚與共的獨特風格。」（盧瑋鑾1997：73）更詳盡的分析可參見也斯(1997)。因為自由、文學自主的理念如果能持守，就可能開拓出較豐富多元的文學藝術空間。

34 經輾轉向部分當事人求證。

- 央委員拉昔·邁丁回憶錄》。吉隆坡：21世紀出版社。
- 也斯。1997。〈解讀一個神話？——也談《中國學生週報》〉，《讀書人》26期，1997年4月號：64-67。
- 小黑。2008。〈細雨紛紛〉，收錄於《回到馬來亞：華馬小說七十年》，張錦忠、莊華興、黃錦樹編，頁191-200。吉隆坡：大將出版社。
- 方莊壁。2006。《方莊壁回憶錄》。吉隆坡：策略資訊研究中心。
- 田思。1994。〈盆栽〉，收錄於《馬華七家詩選》，吳岸等詩選，頁86。吉隆坡：千秋事業社。
- 白垚。2007。《縷雲起於綠草》。雪蘭莪：大夢書房。
- 何國忠。2002。〈尋找自己的身份〉，收錄於《馬來西亞華人：身份認同、文化與族群政治》第七章，頁197-232。吉隆坡：華社研究中心。
- 吳子文。2005。〈《大馬青年》的洞見與不見——試論《大馬青年》的開創與局限〉，《大馬青年》第十二期：82-85。
- 。2008。〈成爲「中國人」：台灣的國族想像與僑生的認同政治〉，發表於「樂·生·怒·活：2008年文化研究會議」，文化大學，2008年1月5-6日。
- 李永平。2002。〈一個游擊隊員的死〉，收錄於《雨雪霏霏：婆羅洲童年紀事》，頁148-183。台北：天下文化。
- 見證叢書編委會。2003。《漫漫林海路》。香港：見證出版社。
- 邱依虹編，黎紹珍、邱依虹、林藹雲譯。2004。《生命如河流：新、馬、泰十六位女性的生命故事——馬來西亞、新加坡抗日、反殖、獨立運動紀實（1938~1989）》。吉隆坡：策略資訊研究中心。
- 姚拓。2005。《雪泥鴻爪》。吉隆坡：紅蜻蜓出版有限公司。
- 范雅梅。2005。《論1949年以後國民黨政權的僑務政策：從流亡政權、在地知識與國際脈絡談起》。台灣大學社會所碩士論文，未出版。
- 。2006。〈「僑生」的前世今生：從歷史看五十年來的留台之路〉，《大馬青年》第十二期：9-12。

- 張貴興。2006。《群象》。台北：麥田。
- 張錦忠。2003。〈（八〇年代以來）台灣文學複系統中的馬華文學〉，收錄於《南洋論述：馬華文學與文化屬性》，頁135-150。台北：麥田。
- 梁放。2008(1986)。〈鋅片屋頂上的月光〉，收錄於《回到馬來亞：華馬小說七十年》，張錦忠、莊華興、黃錦樹編，頁191-200。吉隆坡：大將出版社。
- 莊華興。2006。《國家文學：宰制與回應》。吉隆坡：大將出版社。
- 陳月萍。2004。《美援僑生教育與反共鬥爭(1950-1965)》。暨南大學歷史系碩士論文，未出版。
- 陳凱。1999。《回憶檳吉坡人民抗日鬥爭》。香港：南島出版社。
- 陳慧嬌。2006。《偶然身為僑生：戰後不同世代華裔馬來西亞人來台求學的身份認同》。政治大學新聞所碩士論文，未出版。
- 單汝洪。1999。《森美蘭抗日游擊戰爭回憶錄》。香港：南島出版社。
- 黃錦樹。1997。〈魚骸〉，收錄於《烏暗暝》，頁251-278。台北：九歌出版社。
- 。1998。〈華文/中文：「失語的南方」與語言再造〉、〈中國性與表演性：論馬華文學與文化的限度〉，收錄於《馬華文學與中國性》，頁53-92、93-162。台北：元尊。
- 。2006。〈馬華文學與（國家）民族主義〉，收錄於《中外文學》34卷8期，2006年1月：177-192。
- 劉鑒銓主編。2004。《青山不老：馬共的歷程》。吉隆坡：星洲日報。
- 黎紫書。2008。〈國北邊陲〉，收錄於《回到馬來亞：華馬小說七十年》，張錦忠、莊華興、黃錦樹編，頁1346-361。吉隆坡：大將出版社。
- 應敏欽。2005。《第十支隊與獨立：荊棘滿途的馬來亞民族鬥爭史》。吉隆坡：策略資訊研究中心。

二、英文書目

Chin, C.C. & Karl Hack eds. 2004. *Dialogues with Chin Peng: New Light on the*

Malayan Communist Party.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Chin, Peng, as told to Ian Ward and Norma Mirafior. 2003. *My Side of History*. Singapore: Media Masters.

Koh, Keng We. 2008. "A Chinese Malaysian in Taiwan: Negarakuku and a Song of Exile in the Diaspora.Studies," in *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 Vo1.8 No.1: 50-79.

三、新聞報刊資料

冰谷。2007/10/29。〈可能重出江湖嗎?〉，《星洲日報》文藝春秋版。

童清峰。2008/01/20。〈專訪：中國國民黨副總統參選人、前行政院長蕭萬長——他開啓大馬學生留台之門〉，《亞洲週刊》二十二卷三期：54-55。

黃錦樹。2007/09/30。〈馬華文學與文藝青年〉，《星洲日報》文藝春秋版。

廖宏強。2007/12/30。〈他鄉的故事〉，《星洲日報》文藝春秋版。

四、網路資料

無作者。〈我的祖國（馬來西亞）〉，《維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wiki/%E6%88%91%E7%9A%84%E7%A5%96%E5%9C%8B_\(%E9%A6%AC%E4%BE%86%E8%A5%BF%E4%BA%9E\)](http://zh.wikipedia.org/wiki/%E6%88%91%E7%9A%84%E7%A5%96%E5%9C%8B_(%E9%A6%AC%E4%BE%86%E8%A5%BF%E4%BA%9E))

王德齊、楊凱斌。2007/08/08。〈馬來報章繼續炒作高官再恐嚇 黃明志不唱國歌改唱可愛女孩〉，《當今大馬》網站。<http://www.malaysiakini.com/news/70932>。

李萬千。2007/08/17。〈道歉等於請求減刑?〉，《獨立新聞在線》，知己知彼 / 李萬千專欄。<http://www.merdeka.com/news.php?n=4754>。

《星洲日報》。<http://www.sinchew.com.my>

《當今大馬》。<http://www.malaysiakini.com>

《獨立新聞在線》。<http://merdeka.com>

五、影音資料

anonymous. 2007. *Jungle Green, Khaki Brown: Malaya's Fight Against Terrorism*. Kuala Lumpur: Nickelodeon Books.

Muhammad, Amir. 2006. *The Last Communist of Malaysia*. Kuala Lumpur: Red Films.

———. 2007. *Apa Khabar, Orang Kampung*. Kuala Lumpur: objectifsilm.

黃明志。2007/04/07。《我的朋友》(Kawanku)，YouTube網站。
<http://www.youtube.com/watch?v=6PmAP8GsJjk>。

———。2007/07/15。《(2007大馬觀光年主題曲)我愛我的國家*Negaraku*》, YouTube網站。<http://tw.youtube.com/watch?v=suRXnJaI2nk>。